

寻求秩序、 安全与发展

——俄罗斯转型中的挑战与对策

主编 金重远 唐贤兴 刘军梅



文匯出版社

复旦大学俄罗斯研究 第一卷

寻求秩序、安全与发展
——俄罗斯转型中的挑战与对策

主编：金重远
唐贤兴
刘军梅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求秩序、安全与发展:俄罗斯转型中的挑战与对策/
金重远,唐贤兴,刘军梅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2.7

ISBN 7 - 80676 - 199 - 3

I. 寻... II. ①金...②唐...③刘... III. 政治—
研究—俄罗斯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6085 号

寻求秩序、安全与发展 ——俄罗斯转型中的挑战与对策

主 编/金重远 唐贤兴 刘军梅
责任编辑/梅文革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竞成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355 千
印 张/13.125

ISBN 7 - 80676 - 199 - 3/D · 006
定 价/30.0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

序 言

1991年12月25日,国际舞台上风云突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存在74年后宣告解体,在其废墟上俄罗斯联邦则轰然耸起。

苏联逝矣!然俄罗斯却永存,它地跨欧亚大陆,面积达17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亿,依然是一个世界大国。

俄罗斯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当雄厚的技术力量,经过十年的苦苦挣扎和艰难探索,终于走上了一条政治稳定和经济复苏的道路,越来越为世人瞩目。

俄罗斯是中国的近邻,双方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线。滔滔的黑龙江和漫长的戈壁大沙漠并未把俄中两国分开,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日起,双方便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在历史上,中俄之间既有和平来往的日子,也有兵戎相见的岁月。

进入20世纪,十月革命的道路曾经把中俄两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彼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自50年代末起,一场有关政治和思想的大辩论却又使这两个友邦分道扬镳,逐渐从争论走向对抗、从文斗走向武斗、从矛盾走向分裂……这样的历史竟然持续了20多年之久,这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属罕见。

直到80年代末,才终于峰回路转,两国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

自俄罗斯联邦成立以后,中俄高层领导频繁接触,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从1996年提出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

2000年宣布的中俄将永远做“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再到2001年签署的中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两国的友谊从此建立在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上。

在当今千变万化，充满着不稳定因素的世界上，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不仅对自身，而且还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中俄友好，则双方均可从中受益；而两国交恶，则必然两败俱伤。

我们应“以史为鉴”，发挥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起的作用，努力研究俄罗斯，了解俄罗斯，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自己的贡献。

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3月10日，虽为时不久，但在教学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1年10月27日，我们中心召开了关于“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学术研讨会，递交给研讨会的大多数论文被收录于本书中。本书同时还收录了我们中心成员最近所撰写的尚未发表的一部分论文，部分未与会的校外学者也向本论文集提供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经济学家梁赞诺夫院士也向我们贡献了他的创造性思想，对所有这一切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院的大力支持，我们中心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学院的扶持是分不开的。

本书就俄罗斯当前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分别进行了阐述。本书的所有观点都是每一位学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任何组织机构和团体的观点。由于研究深度不够和学术水平有限，本书存在着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同行和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金重远

2001年12月于复旦园

致 谢

本书是我们复旦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于2000年3月10日成立以来的第一本集体研究著作。我们名之为“复旦大学俄罗斯研究第一卷”，意味着将有第二卷、第三卷……贡献给所有关注俄罗斯问题的读者。显然，这仅仅是第一步，也许是十分稚嫩的一步。

在此，我们要向所有为我们写稿的校内外研究者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意义，不仅仅是有了今天这本书，还在于他们为俄罗斯问题研究贡献了他们独特的真知灼见，从而丰富和推动了俄罗斯问题的研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虽然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同本中心没有任何行政上、财政上、人事上的上下级关系，但它一直关心着本中心的发展，因此，任何言辞都不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学院院长倪世雄教授、常务副院长林尚立教授、副院长胡雨春副教授一直主张要扶持俄罗斯问题研究；林尚立和胡雨春两位教授还多次参加了本中心的活动，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历史系办公室主任王国珍先生和程仲芳女士，他们虽不是本中心的成员，但一直无私地承担着本中心的很多事务，从本中心的会议到这本书的出版，都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历史系和国际政治系资料室的同志，为中心成员写作此书提供了诸多帮助。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张爽、于迎丽、薄燕、俞沂暄，研究生陈佳楠，积极参加本中心的每项学术活动，并为

研讨会的召开做了很多工作。研究生徐珏、王莉、杨阳、侯颖四位同学非常认真地校对了全书,并对本书的版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没有上述这些人士的支持,很难想象本书能较快地问世。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的同行们,尤其是他们的博士生刘军、侯德贤、王新俊热心地组织了他们中心的青年学者为本书写稿,并参加本中心的学术活动,对于他们的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金重远 唐贤兴 刘军梅

2001 年 12 月

导 论

唐贤兴

“转型学”与俄罗斯的转型

当前,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所发生的混乱而猛烈的变化,正在使俄罗斯社会发生深刻的转型。这为转型学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和生动的经验材料。然而,学术界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型还存在很多不同的概括和争论,其中,克劳斯·奥夫把这种转型称之为“三位一体的转型”^①。目前,政治科学家们和俄罗斯问题研究者们似乎已经广泛地接受了这一分析模式。“三位一体的转型”可以用下列三个术语来分析:国家认同、政治和经济。根据奥夫的理解,“国家认同”包括新国家的边界困境、少数人的权益、大众对新国家的忠诚等方面的问题;“政治”方面则包括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运动、宪法秩序的产生、政府实践中实施宪法等内容;而“经济”转型主要是指在先前中央命令经济中实行市场化和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不平等、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与这个过程有关。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三位一体的转型模式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分析过份简略化,往往忽视对俄罗斯转型过程中这三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分析。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俄罗斯的转型应该说是全方位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试图

^① C·奥夫:《民主设计的资本主义? 面对中东欧三位一体转型的民主理论》(Claus Offe, "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1991年冬季号,第58卷第4期,第865~92页。

把某个领域的转型看作就是俄罗斯的转型,那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同时,我认为这一分析模式主要还是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既然俄罗斯的转型是全方位的,那么,国家和政府及其领导人、政治和社会精英、利益集团、社会大众等等,都应该是重要的分析对象。国内外学术界对当代俄罗斯的转型缺乏理解,比如,很多西方评论家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一方面,他们得出了一个不成熟的结论,认为俄罗斯已经建立起了民主和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又是灰暗的宿命论,认为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独裁主义和腐败。正如 A·布朗指出的,人们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一直缺乏理解,而且被过份简单化了^①。

布朗的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当然,把责任全部归诸学者也是不公正的,因为现实中的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持续的不确定性和高度的复杂性。自戈尔巴乔夫 1985 年执政以来,苏联及其后的俄罗斯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苏联解体以及新俄罗斯的诞生虽然已经过了十年,但是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已经过渡到了什么地方,还不很清楚。要搞清楚这一点,现在看来似乎依然过早了一点。从国际经验来看,所有的重大的社会变革都需要数十年,而不是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十年,美利坚合众国依然没有一部宪法;而 1799 年的法兰西则依然处于大革命后的混乱状态之中。今天,政治科学家们并没有为我们在急速变迁时期增强预言能力提供多少帮助。

然而,大规模的变迁使价值和先前稳定秩序下的信仰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因此有必要对剧烈变化着的不同环境作出解释和回应。而且,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很多新的东西已然存在,其中一些轨迹在转型过程中逐渐清楚起来。因此,从十年后的眼光来审视俄罗斯十年来的转型,总结俄罗斯转型和发展中的问题和教训,检讨和检验转型学中一些基本的假设、理论和观点,既是必

① A·布朗:《当代俄罗斯政治概论》(Archie Brown, "Introduction", in A. Brown ed.,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 A Reader*),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要的,也是可能的。

寻求秩序、安全与发展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通过本书作者的描述、分析和揭示,人们可以看到,秩序、安全和发展是最重要的方面。首先,它们既是并列平行的目标,也存在着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们很难确定什么是俄罗斯转型中的首要目标。其次,转型过程中的目标和转型完成后的目标应该是有所区别的,比如秩序在转型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随着秩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中的确立,人们遵守秩序将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会侧重于其他方面的价值,比如保护人权和环境等。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转型还远未完成。在国家(政府)政策设计和选择上,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混乱状况,转型目标体系的设计、轻重缓急的次序安排等等,还没有完全理顺。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混乱、无序和失控。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是最根本性的。由于转型是以激烈否定“旧制度”和“旧秩序”为起点的,而“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建立则不是同一个过程,因此两者之间产生了脱节现象,从而引起了秩序上的真空。在国家的政策选择上,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的目的,领导人主观上曾放任秩序的失控,比如叶利钦对地方的主权许诺,私有化过程中放任对国家资产的“盗窃”等等。随着社会各个领域里矛盾的堆积和爆发,人们发现“秩序”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奢侈品。为了重新建立有组织的秩序,俄罗斯的领导人,从叶利钦到普京,都采取了很多相关措施。秩序的重建是俄罗斯社会各个领域的任务,本书各章所分析的,无不体现了俄罗斯对这一目标的追求。

不安全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俄罗斯人的不安全感既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在十年多的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的国力一落千丈,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由先前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二三流的国家。这制约了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实际作为

的能力,对俄罗斯实现国家利益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另外,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不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从对西方人对车臣战争的态度所作出的回应中,从对西方科索沃政策的抵制中,从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所抱的矛盾态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种种忧虑。从国际关系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角度来看,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如何适当地定位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十年来俄罗斯尚未能建构出符合发展所需要的对外战略模式。不仅如此,俄罗斯人的不安全感显然还来自其国内秩序的混乱。有组织犯罪的蔓延、法制的疏怠、社会秩序的混乱、贫富分化的加剧、依然存在的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的隐患、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日益抬头,等等,让俄罗斯领导人深切地认识到俄罗斯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家内部。因此,无论是秩序的重建,还是寻求发展的努力,都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寻求安全贯穿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各个领域。

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第三个严重问题是与衰败、失败、倒退等联系在一起的消极现象。俄罗斯转型时间的延长给最终出现的政权类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了很多后果。从十年来的具体经验来看,致力于发展是俄罗斯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创造一个文明的、民主的和富强的社会。然而,事与愿违,众多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不是这种理想画面,而是各个领域的衰败和倒退,经济持续滑坡,政局不稳,社会迷惘……不过,客观地讲,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中,没有一个俄罗斯人、没有一项政府政策,在主观上想导致俄罗斯走向衰落。到目前为止的各个领域的变革,都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一些方面出现了积极的成果。本书各个部分的分析所揭示的,都是俄罗斯的发展。

本书内容梗概

现在,我们对本书各个部分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第一编集中论述的是“政治转型过程中的秩序”。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社会所发生的复杂转型的典型。

唐贤兴和刘军梅博士在第一部分中尝试借用“复杂性”这个哲学概念来建构俄罗斯的过渡政治学分析框架。尽管这是一篇框架性的文章,但作者提出和分析到的问题却是非常深刻的。作者认为,在俄罗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政治转型同时也是经济转型,反过来也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而是指一种复杂关系。因此,试图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政治转型,或者纯粹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经济转型,都是不恰当的。作者不同意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的观点:俄罗斯政治转型中的很多问题,是由其激进的转型模式带来的。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政治转型经过了制度破坏、制度重建和秩序整顿三个彼此交错的环节,在每一个阶段中,渐进主义都是一种可行而必要的转型政策选择。

联邦中央与地区(方)关系是俄罗斯政治转型和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苏联的解体跟苏共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紧密相关,更为所谓的“联邦制改造”所推动^①。王伟博士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俄罗斯确立新联邦关系过程中的斗争和博弈作了独到的分析。为了规范国家权力结构的纵向秩序,普京对国家结构作了重大调整,通过设立“大区”等制度安排来规范秩序。客观上讲,这是符合俄罗斯现实发展逻辑的。但普京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和国内一些人士的不安和反对,担心俄罗斯可能回到以往的极权主义。王伟博士最新颖的观点是,制度性方法在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过程中的有效性必须通过其灵活性体现出来,“宪政设计的权力平衡的原则和对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应使社会的管理和权力的运作合法而有效率,权利与责任平衡。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宪政体制不能过于僵硬,而要具有一定的弹性,使宪法

^① 参见海运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第九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苏联联邦制问题还跟民族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关于这一问题的权威论述,参见[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对于普京政权以来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以及普京可能的发展对策,目前国内学术界论述得比较详细的是李方仲的《苏联解体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普京政权面临的问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原则能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转型过程中的法制建设有着绝对的重要性。法律改革以及法律强制是民主转型的中心问题。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非常明显地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没有妥善处理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问题^①。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问题的产生，有着复杂的背景，但法制的废弛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普京执政后提出了“法律专制”的主张。西方学者对普京的这一主张颇为担忧，害怕对幼稚的民主产生消极影响。在《俄罗斯的司法改革与变化中的法律秩序》中，杨心宇教授揭示了俄罗斯司法改革的背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认为俄罗斯司法改革的宗旨恰恰在于改变叶利钦时期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做法，以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一有说服力的分析启发我们，什么时候俄罗斯能在法制范围内解决社会和政治冲突，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便可宣告完成。

讲到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人们自然还会联想到金融寡头对国家政权的操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黄永鹏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政权与金融工业集团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剖析，认为金融工业集团实际上是在政权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是一个“政治制造物”。私有化运动和政府的政策优惠使对国家资产的盗窃行为成为“合法”；为了防止俄共在竞选中获胜而对金融工业巨头的拉拢则使寡头进入政权成为可能。所以，确切地说，寡头和政权之间

^① 在危机爆发之前，很多人还认为这些问题只是使俄罗斯的转型变得复杂化的边缘性问题。很多西方人也认为，俄罗斯正在向一个和平的、稳定的民主过渡，运作自由市场的制度能力正在不断提升。事实证明，俄罗斯人和西方人对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及其后果估计不足。危机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腐败和犯罪的迅速蔓延已经或正在使民主化和市场改革进程脱离轨道，而且这恰恰削弱了国家发挥作用的能力。有研究者深刻地指出，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应该成为俄罗斯问题经济分析的中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参见刘易斯·谢利：《俄罗斯国家正在处理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问题吗？》（Louise Shelley, “Is Russian State Coping with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载V. 斯柏林编：《建设俄罗斯国家：制度危机和寻求民主统治》（Valerie Sperling ed., *Building the Russian State: Institutional Crisis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西方观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是“相依为命”的关系。这种在政治秩序的转型过程中的不正常现象,不利于俄罗斯民族资本的成长。作为普京秩序整顿的重要内容,打击寡头、清理国家政权与金融工业集团之间的关系,便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个问题既是政治学的研究课题,也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毫无疑问,俄罗斯政治转型的一个价值和目标取向是向民主过渡,拙作《俄罗斯向民主过渡:问题、模式和前景》一文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俄罗斯被看作是一个民主化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关于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定位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一些学者将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的政治体系描述为“选举民主”(an electoral democracy)^①:选举总体上看是自由的和公正的,但是法制很软弱,民主制度不发达,国家官员对公民很少有责任感,立法和司法几乎还不能对行政进行有效地控制,联邦政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能力也很弱小。也有的学者以“代表性的民主”这个术语来描述俄罗斯转型中的政治体系。这个概念最初是盖勒莫·奥-唐奈尔用来描述从权威主义向民主过渡的那些国家,后来被人们借用到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分析中来^②。该文认为,

① 参见 Adrian Karatnychy, Alexander Motyl, Aili Piano 等编:《转型中的国家(1999-2000):中东欧和新独立国家的民间社会、民主和市场》(*Nations in Transit, 1999-2000: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and Market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纽约:自由社,2001年版,第351页。

② 奥-唐奈尔认为,在这一过渡中,总统制民主的制度和规范被人们所接受,但是民选的总统以权威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因为像立法机构等这样的机构并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威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在那些有着弱议会传统和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社会里,“代表性民主”下的总统在宪法上被合法地授予“自由之手”(free hand)的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参见 G. 奥·唐奈尔:《代表性的民主》(G.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1994年1月号,第5卷第1期,第55-69页。受到这个概念的启发,有的学者也把俄罗斯的政治归入到“代表性的民主”中去。参见 P·库比塞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性民主》(P. Ku-bicek, "Delegative Democracy in Russia and Ukraine"), 载《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94年,第27卷第4期。

俄罗斯目前的政治转型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而是如何巩固民主的问题。从选举的角度来定义民主,是对民主的最低程度的界定,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长远观点来说,这样的界定是不够的。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对所谓的权威主义模式适用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分析提出了怀疑。俄罗斯悠久的独裁统治传统,领导人的个人偏好,以及社会秩序的需求等等,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向民主的转型必然会是权威主义模式的^①。

第二编的内容把视角转向外部因素,希望透过国家的外部因素来审视俄罗斯的转型。在这里,安全被当作重要的转型价值。在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既反映了其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也成为俄罗斯寻求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分析俄罗斯的转型,必须把其内部制度变迁与外部关系因素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俄罗斯安全中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北约东扩。在第二编中,有两篇论文涉及到北约东扩问题。尽管俄罗斯与北约不久前达成了“20国”机制这种新的关系和形式,但于此此前写就的这两篇论文在

① 西方的和一些俄罗斯本土学者在评价叶利钦、普京及其政府时,都非常强调他们及其政府日益增长的专断行为,并把这当作转型过程的一个失败。这种看法目前成为学者们的一个总体性趋势。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人的行为和态度总是与环境相联系的,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作为总统,叶利钦和普京的行为不是纯粹的个人偏好的反映。在W·雷辛格等人看来,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有两个方面假设:对强有力领导的期望和对社会秩序的偏好。参见W·雷辛格、A·米勒、V·海斯利和K·H·马尔:《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政治价值观:民主的来源及其含义》(W. Reisinger, A. Miller, V. Hesli and K. H. Maher, "Political Valu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Lithuania: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英国政治科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4年4月号,第24卷第2期,第183~223页。俄罗斯有悠久的独裁统治传统,以致于一些人甚至声称俄罗斯人有一种产生独裁主义领导人的文化倾向。在我看来,强有力的领导并不必然意味着“权威主义”的或反民主的政治文化,它与民主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是消极地联系在一起。人民寻求强有力的领导人来摆脱当前的危机,在俄罗斯的宪政框架中,立法机关在法律上很软弱,人们希望有一个严格的议会制度,但失望的人们把目光转向了领导者个人。

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唐朱昌和赵华胜两位教授的论文很有见地地指出,尽管俄罗斯从不同角度反对北约东扩,但普京政府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立场决定了俄罗斯将愿意与北约合作。这肯定会对中俄关系(或形成中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俄罗斯一旦加入北约,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将增加新的变数。在这一点上,李海东博士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认为,美俄之间的诸多分歧决定了俄罗斯在短期内不可能加入北约,然而从长远来看,由于美俄之间的分歧尚不是根本性的矛盾,而且俄罗斯加入北约是实现欧洲安全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肯定,双方将不断推进彼此的合作。

至于俄罗斯将来的外交重心是欧洲,还是美国,抑或东方,李海东认为是前者。汪晓风博士试图从欧盟扩大的角度继续支持这样的观点。作者从“大欧洲”的产生必须以俄罗斯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这个假设出发,提出了欧洲格局的板块结构理论,认为后冷战时期的欧洲三大板块是不稳定的板块。尽管欧盟东扩将使俄罗斯面临考验,但是俄罗斯最终希望融入西欧体系中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问题专家金重远教授,似乎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俄罗斯在冷战后对亚洲政策的调整旨在实现其重返亚洲的目的。俄罗斯的亚洲政策是全方位的,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将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

坦率地说,中国学者在讨论俄罗斯外交战略是以欧洲为重点还是以亚洲为中心这一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情结。这使得中俄关系问题的讨论在学术界持续升温。历史、地理和现实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俄罗斯的亚洲战略甚至全球战略必定将考虑中国的因素。金重远教授已经指出,俄罗斯全方位的亚洲政策中,中国是不可动摇的要素。潘光教授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进程所作的分析,也凸现了中俄关系对于双方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基础。这一观点实际上启示我们,如果有外力因素使中俄关系发生变化,那么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甚至意义可能会发生变化。显然,